

戏说古人之风,据说已始淫淫当代之史。“端出王关戚”的政治内斗,戏说成戚才子欲以一部《红楼》染指“公主”,而老江青再演棒打鸳鸯的狠手戏;逼死贺老总的残忍缘由,戏说成贺夫人薛明对于叶群的一个白眼……于是人们要说,一部当代史,墨迹未干,其人犹存,怎么就来戏谑笑谈,那“胆子”岂不是太大了一点?

但也有有识之士论曰,对于当代史的玩弄,岂只是一个戏说而已,不少的书摊报亭之中,业已充斥着由“戏说”而成“胡说”的“出版物”,说其“胆大”,斥其“妄为”,远不是一言戏说可以遮盖的。

这大概是有道理的。比如写反派人物的一命呜呼,就有指鹿为马、颠倒黑白的。有“史”记一代巨逆陈公博之死,说他朗笑而赴刑场,缓步找了棵“铁骨铮铮”的菩提,从容整衣,盘腿而坐,高声而曰“此处甚好”,然后从容饮弹。这样的生死度外,如此的视死如归,几乎要叫人不敢相信那汉奸的真伪!然而打开信史一看,陈逆之死,并不那么漂亮,而这一段关于临刑的“悠然大度”,尤其是“此处甚好”的笑归之声,却明明是瞿秋白烈士刑场上的朗言大行,不知如何给人“目击”了去,再硬生生安在了国贼头上——这不是“胡说”么?!

除了胡说奸逆而外,还有胡说伟人的。例如曾担任过中央警卫部队的八三四一,竟也被拉扯到某些“纪实”之中,说那番号,正合了毛泽东一生之数。那八三,是伟人的寿数;而从遵义会议到领袖正寝,不正是掌权了41年么?更有

高处凉亭（中国画） 韩锦田



在庆祝海峡两岸交流20周年之际,台湾实力派画家韩锦田先生带来他近20年探索成果在上海美术馆展览。

这些画去掉了皴法,减少了笔趣,运用他多年揣摩的独特泼墨法,营造出幻变的画面:山雾迷茫,云涌烟飘,韵律动感,再用笔勾出些房舍、树木花草、小舟等。这些富含抽象意念的具象景物,都是画家对大自然的阐释。

在表现“象形”和“意境”的相互关系时,“意境”始终放在中心地位,从远观到近看都不失中国画本体。展品中有的题了字,抒发情怀,有的仅写“造境”,表明为观者制造一个环境,任凭观者去想象和体会。

水墨拓新,不仅要求笔墨功底,更要求生活底蕴。他已有60年绘画生涯。

1978年,张大千回台湾定居,韩锦田成了他料理盆栽的首选人。大师年长他近一倍,从不对他直呼其名,不是“老师”,就是“小老弟”,成了忘年交。交往中,韩锦田从没说过画画,因为他的心目中大师太大了。有一天大师到他家看盆栽,才知道他的绘画才能。韩锦田画了幅《大千居士赏梅图》,大师连连说:“你基础很好,要画,要画!”从那以后,大师作画时经常将他拉在身边指点他。他看大师作画时,手指在裤袋里一笔一笔模仿。大师仙逝后,有人跟他说,你的画太像张大干了,就写上张大干吧!他说,我绝对不能背叛他。他又下苦功,终于创出自己风格。1994年他出版画册,在美术界引起震动:有张大干的影子,更是韩氏风格!

甚者,今天说这“天数”,是当年苏区富田事变时一算命先生告知“毛委员”的,明天又说那玄机,乃中央进京之日“西山那边”某老道向伟人面授的机宜云云。这真是将无由的巧合,变成了传奇的“宿命”;又将迷信的色彩,强加于笃信唯物论的共产党人头上——这不是典型的“胡说”,又是什么呢?

其实最离奇的胡说,还在于近年来对于一些公案的揣测。例如月黑风高“九一三”,便已有了林林总总的“揭秘”,说是那天夜里,三叉戟上并无那对夫妻!什么根据呢,说是在温都尔汗那烧焦的女尸口袋里,掏出过几枚什么药片,而“推断起来”,像她那个年龄,已不会再服那劳什子了,所以“进一步推断”,那女人“可能”不是“主任”,所以另一具烧焦的秃男之尸也“可能”不是那“永远健康”!请看多么荒唐的“根据”,请听何其妄然的“推断”!凭两片十分可疑的“药片”以及完全不着边际的“逻辑”,居然也来洋洒。而这一切,又据称都是听一个洋人说的,舶来给国人看——那就真是原来意义上的“胡说”了!

从“戏说”到“胡说”,确看得出某些“史家”铤而走险的轨迹,所以友人之间,也有提醒注意他们的“意在沛公”以及“弦外之音”的。我的脑海里,倒没有这么一根弦,认为他们不见得是要翻什么案,达到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,所以又来搞“一大发明”。只是如此的大胆、这样的妄为,仅仅说一句“财迷心窍”就可以解释得了吗?只能求教于读者诸公惠眼明鉴了。

那时节,上海人还不懂得如何怀旧。于是,《海上旧梦》就成了一个模本——它使上海人的素朴的生活重新活泛起来,哪怕是一碗豆浆,一客小笼,由于壁墙上挂着陈逸飞的《夜宴》或者《浔阳遗韵》,也便有了一些个矫饰的艺文的气质了。

30年代,上海作家徐许写过一部小说,名《鬼恋》,里面有上海式的感伤,也是另一个意境的《色戒》。

香港影人吴思远亦是上海痴,但凡是关于上海,他的腿就软了,就绕不过去了。他看中了徐许的小说,也看中了陈逸飞。他对陈逸飞道:

“你来拍,拍一个地道的上海故事,要像上海小菜,浓油赤酱。”

陈逸飞自然受用,暂别画室,做起了导演。

有一个镜头,一定要有一段碎石子路才对。

去找。没有。都柏油路了。

精美礼品后的感觉是高档典雅、珠联璧合。

看到礼品袋的人都说精致、漂亮,可怎么知道这些小布料当初差点就被扔进了垃圾桶。其实有些看似没用的东西,只是暂时没有找到能利用的地方,只要稍动一下脑筋,用充满创意的眼光去看见和发现,你就会觉得身边的东西很精彩。合适的就是最好的。一个个乐利枕的牛奶箱包上相同颜色的格子布就成了杂物的收纳箱,放在架子上既整齐又漂亮,绝对不比商场卖出的收纳箱逊色。白色小毛巾镶上一圈彩色格子边就成了家庭主妇们喜爱的擦手布,挂在厨房、卫生间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,零碎花布做成一个个小拎袋,成了妈妈们买菜、逛超市时的最爱……旧元素新组合与时尚接轨是我设计制作的理念。

叶老师看。因为叶老师是《曙光医刊》的主编,我有些业务方面的文章都找他指点,他总是一视同仁,反复斟酌,有时还放在头版头条发表。因此他在我心目中,不仅仅是知识渊博,而且有师长的感觉。

当他看到我的这篇文章之后,马上写了一封信,让我去找晚报的吴承惠先生(后来才知道他的笔名就是秦绿枝),把文章交给他。过了几天,此文章

不是音乐就是电影,上世纪90年代初的每一个下午都是阳光灿烂的。那天午后,在上影厂的试片间里,看还没有来得及合成的纪录片《海上旧梦》。

感觉中,陈逸飞是把他的画转化成了胶片。

影片中,陈逸飞把自己扮成都市漫游者,不断地与上海的老灵魂相遇。茶楼,石库门客堂间的麻将桌,红砖黑漆门上的信箱牛奶箱,油条,糖粥,小馄饨,温热的绍酒,总也吃不完的五香豆——

再等等,等不下去了,饿了,也困了,就先回去了。

后来听说,他们在那里等了好几个晚上。

平日里,陈逸飞使用沪语,他觉得沪语与他亲。

在美国,去一位犹太人家做客。女主人出来开门,用老式沪语问:

“依是上海人?”

纳粹时期,女主人逃来上海,幸免于难。她对上海心存感激。

回得上海,女主人地道的沪语,时不时地跑出来敲打着陈逸飞的神经。陈逸飞在这句沪语里,体悟到了上海的深厚。1996年,陈逸飞开始执导他的第三部电影《逃亡上海》。台本拍了一半,钱就没有了。

一个转身,陈逸飞回到了画室。他的画总是可以卖出好价钱的。

陈逸飞的画室其实就是汽车间。那些麻将玩到半夜的邻居,都十分熟悉陈逸飞在汽车间里作画的样子。

卖了画,回来继续拍上海。那种样子,譬如谈恋爱,不问值得不值得的。

那一日,在泰康路田子坊陈逸飞的工作室,喝着“毛伊”牌咖啡,墙上依旧挂了画,不过不是陈逸飞的了。一种人去楼空的冷清。其实这里一直是冷清的。陈逸飞没有时间。在上海,他有太多的事情要做。他总说:

“上海是我的灵感。”

斜刺里,一把太师椅,记得是《海上旧梦》的道具。

是了,陈逸飞也是旧梦里的一件道具了。

竟然真的在晚报的夜光杯上发表了,我内心非常感动。因为我与叶老师并没有太多的交往与感情,只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,我刚从农村抽调上医院,作为劳动锻炼,我参加了挖防空洞和打扫卫生工作。

有个胖老头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,总和我们一起干。有一次,我患腹泻,他得知后给我吃些药,果然几天之后就好了。我想不通,这个打扫卫生的老头,怎么这么有本事。后来才清楚,他原来是儿科有名的专家医生,现在是监督劳动,整整8年。我又想不通了,既然是医生,

为什么不能让他去看病,要来打扫卫生,这不是浪费吗?而且有些年岁了,走路弯腰都不方便,看上去怪可怜的。有一次,他足癣感染,走路痛得厉害,我就主动帮他敷药换药。

虽然我涉世不深,不可能理解这么深奥的问题,但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他是好人。后来他为曙光医院文化建设所作出的贡献也证实了,他是一位值得我们尊敬的老前辈。

曙光百年不平坦,杏林茁壮靠英才。

先贤耕耘有今天,更待岐黄百花开。

明日请看《那伏案的背影》。



手表,曾经的贵族,已经被我冷落了多年,因为手机成了新宠。最近听说有一款上海牌手表标价人民币15万元,让我十分惊讶,特意赶去钟表店观摩,没想到,表已售出。后来在一个博览会上,才见到尊容:原来,它的机壳是18K玫瑰金,表面表壳上共镶嵌有381颗天然钻,机芯采用经典陀飞轮,表带则是鳄鱼皮的。我寻思着:这么昂贵的一枚国产表,为什么有人居然要买呢?

看来我是隔行如隔山。有位手表行业的专家笑着告诉我:手表,已经从时间功能上派生出两大价值:一是显示主人的身价,二是用于收藏。如是说,这便是有人购买那款15万元手表的目的了。

顺着这个思路,我开始饶有兴趣地观察上海的手表市场,竟然发现是很闹猛的,并不像是我想象中的,这个表厂关了那个表厂关了,似乎一片萧条。

简单地概括,这类市场分为低档和高档两种。低档的就是分布于角角落落的地摊和小店,出售廉价的乃至十元二十元的手表,购表者大约是单单使用其时间功能的。有趣的是,也有人专门在收藏世界名表的冒牌货中的精品,可谓一绝。高档的专业表店,粗粗地估算;南京路上就有9处店面,淮海路上也有4处,这还不包括那儿的大商厦,也不包括上海其他的热闹地段。在这些表店里,陈列的几乎都是瑞士手表,也有少量的日本名表,国产名表也有专柜,可惜设在一个地下商场。这些瑞士表的价位,大致上在几千元至数万元数十万元。看来,光顾者也不少,否则,开了这么多店,进了这么多货,积压的资金吓死人,岂非发蠢?换句话说,购买几万元几十万元、甚至更昂贵的手表,也大有人在!前面提到的那款15万元的上海牌,据说是换成类似的瑞士名表,恐怕位位要高几倍。

这就又引出一个话题:品牌手表还是贵族,贵族的标志就是品牌。据说上海牌手表的技术水平已经接近瑞士手表,但是瑞士手表品牌所拥有的历史、文化内涵,是世上独一无二的。因此,收藏价值也很难估量了。

假如我没记错的话,从上世纪60年代一直到90年代,在上海人中比较知晓的瑞士表主要是英纳格、罗马、西马之类,当然也有欧米茄、浪琴、梅花。上世纪60年代早期的普通英纳格在上海标价为150元左右,相当于一个满师后的青工三个多月的工资。当时有人戴一块英纳格的话,周围人为之艳羡。想不到时过境迁,英纳格之类品牌的标价虽说大多数已是几千乃至上万,但在高档表店里竟然算是中低的价位。那些令我陌生的名称:百达翡丽、江诗丹顿、爱彼、宝玑、伯爵、卡地亚、积家、劳力士、芝柏……一个个身价惊人、尽显世界大牌风范。看了些资料,方知江诗丹顿早在230年前,也就是中国的乾隆时代,它就问世了,大概可以算作手表中历史最悠久的品牌;宝玑,乃是皇家的爱物,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和皇后玛丽,英国女王维多利亚,英国首相丘吉尔都对此垂青。随便扫一眼,标价大多是6位数的。服务员彬彬有礼,我只能嗫嚅而别。心里却是很奇怪,为什么我们过去从未在市场上见过这些世界大牌?现在想想容易理解。

几十年来,我们的生活水准是温饱型的,那些标着昂贵价格的世界大牌有必要有可能放进上海的表店里吗?还是个国情问题。

社会开放了,经济发展了,人们的口袋里有钱了,眼界自然也开了。那些贵族也一个个不请自来了,好比中国的瓷器,手表也是世界文明进程中的重要产物,值得全人类共享。15万元的上海牌手表也好,瑞士名表也好,貌似贵族,其本质上还是涵义深刻的计时器。

为什么不能让他去看病,要来打扫卫生,这不是浪费吗?而且有些年岁了,走路弯腰都不方便,看上去怪可怜的。有一次,他足癣感染,走路痛得厉害,我就主动帮他敷药换药。

虽然我涉世不深,不可能理解这么深奥的问题,但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他是好人。后来他为曙光医院文化建设所作出的贡献也证实了,他是一位值得我们尊敬的老前辈。

曙光百年不平坦,杏林茁壮靠英才。

先贤耕耘有今天,更待岐黄百花开。

明日请看《那伏案的背影》。